



中国近代战争史（二）

李大伟 编著



目 录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后期）	1
天京内讧及战争形势	1
石达开率军远征与最后失败	4
二破江北大营与三河镇大捷	14
二破江南大营与东征	21
安庆会战	31
李秀成部回师江浙与再攻上海	46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最后失败	55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失败的教训	78
捻军的起义斗争	86
捻军的兴起	87
转战皖豫边与太平军配合作战	90
接受太平天国领导	97
捻军与太平军的整编及斗争	120
捻军起义的经验教训	154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后期）

天京内讧及战争形势

1856年，太平军继西征战场转败为胜之后，又先后攻破了威逼天京数年之久的江北、江南大营，太平天国革命再次出现了有利的形势。可是，与此同时，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内部危机日益加深，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杨秀清与韦昌辉、石达开之间的矛盾越来越表面化，终于在当年秋天发生了可悲的天京内讧。这是太平天国战争史上最大的转折点。

总揽宗教、政治、军事三权于一身的杨秀清，成了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之间各种矛盾的焦点。他有出色的政治和军事才能，但“自恃功高，一切专擅”，以致天王洪秀全“徒存其名”。太平军一破江北、江南大营之后，杨秀清先则将北、翼、燕诸王立即分派离京，继则假托“天父神旨”，公然逼迫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秀全迫于杨秀清的权势，当面应允，暗中则采取措施，伺机铲除杨秀清。

当时，北王韦昌辉在江西战场，翼王石达开在湖北战场，燕王秦日纲在丹阳前线。9月1日夜，韦昌辉率三千余人从江西秘密赶回天京，随即对东王府发动突然袭击，于次日晨将杨秀清及其家属、近臣全部杀害。接着，韦昌辉又对杨秀清的部属进行了大屠杀，太平军将士和群众二万余人罹难，在天京造成了严重的恐怖。10

月初（一说9月中旬），石达开从湖北赶回天京，责备韦昌辉滥杀无辜。不料韦昌辉又想加害于他，石达开便连夜逃出天京，其家属则被韦昌辉全部杀害。于是，石达开从安徽、湖北等地调集四万大军，集中于安徽芜湖、宁国府（今宣城）一带，准备回京讨韦。

韦昌辉的大规模屠杀和擅专朝政，激起了天京内外太平军将士和群众的极大愤慨。在此情况下，洪秀全下诏将韦昌辉处死，同时被杀的还有参与大屠杀的燕王秦日纲等约二百人。事后，洪秀全派人将韦昌辉等人的首级送安徽宁国府交石达开验看，并召其回京辅政。约11月底，石达开回到天京，延续两个多月的天京内讧，至此暂时告一段落。

石达开是东、西、南、北、翼五王中的仅存者，加之智勇兼备，在太平军中夙有声望，并为清军将领（包括曾国藩）所畏惮。因此，由他辅政，受到天京军民的拥护和欢迎。但是，内讧的阴云并未因此消散。洪秀全从天京大变乱中错误地汲取教训，自此之后，他只信任洪姓族人，排斥异姓。他在委托石达开辅政后不久，又加封其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并让他俩与石达开同主朝政，以牵制和监视石达开，最后并有图害之意。石达开既无法施展其才能，更害怕遭到与杨秀清相同的命运，便于1857年5月底离京出走。

石达开被迫出走，实际上是天京内讧的继续。由于天京内讧和石达开从天京及其它地区带走大量部队，太平天国的元气大伤，整个战争形势也随之急剧逆转。

在江苏战场，江南大营的击破和向荣的死去，曾使清军遭到沉重打击。但由于天京内讧，给了敌人以重整旗鼓的机会。1857年7月16日，清军攻陷句容，12月

27日又攻陷镇江和瓜洲，太平军守将吴如孝逃回天京。1858年1月，清军恢复江南大营，再次围困天京。

在湖北战场，由于石达开东返天京，清军加紧围攻武昌。太平军守将韦志俊因困守已久，又不见援兵到来，加之其兄韦昌辉在天京被处决，丧失了坚守的决心，遂于1856年12月19日放弃武汉。武汉一失，鄂东各州县随之不守，太平军的湖北根据地全部丧失。

在江西战场，湘军于1857年10月26日攻陷湖口和梅家洲，被太平军分割二年多的湘军内湖与外江水师得以重新会合，这一带的长江水面又被湘军控制。1858年5月19日，九江城被新任浙江布政使李续宾所部湘军攻破。驻守该城近五年的太平军将领林启容率部进行了英勇的巷战，一万七千名将士全部牺牲。

太平天国虽然处于十分严酷的形势之下，但由于以下种种原因，没有发展到迅速崩溃的地步。

第一，当时全国仍处在革命高潮之中，北方的捻军、南方的天地会，以及西南各族人民的起义战争，正在蓬勃发展，方兴未艾，使得清王朝顾此失彼，忙于招架，客观上给了太平天国革命以很大的支援。

第二，1856年10月，英、法等资本主义列强，为了在中国攫取更多的殖民特权，悍然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虽然实行妥协求和政策，但也不得不以很大的注意力和相当一部分兵力去对付外国侵略者，于是相对地减轻了对太平军的压力。

第三，石达开虽然离京出走，但他率军远征东南各省，吸引了一部分清军兵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清军对天京方面的压力。

第四，活跃在安徽战场的陈玉成和李秀成所部太平

军，积极进击，顶住了清军沿江东下的势头。先是李秀成被围于桐城一带，势孤力单，后于 1857 年 1 月初与陈玉成在枞阳商定了破敌之策，确定对包围桐城之敌采取大包抄。1 月中旬，陈玉成自宁国渡江北上，占无为、巢县，转攻庐江，然后直趋桐城。李秀成也率部出城，与陈玉成部协同，夹攻桐城外围之敌。2 月 24 日，大败福建提督秦定三等所部清军，并乘胜于 27 日攻克舒城。3 月初，太平军克六安，接着挥师北上，与捻军胜利会师。捻军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后，在淮河中游向清军展开积极进攻，牵制和削弱清军兵力，使陈玉成得以率军进入湖北，在鄂东地区转战经年，阻扼鄂军东犯，稳住了皖北太平军根据地。

正是这些客观条件，使太平天国得以继续坚持革命战争。

石达开率军远征与最后失败

1857 年（咸丰七年）5 月底，石达开自天京出走，率领听其指挥的数万部队，在苏皖交界处的铜井镇渡江，途经无为，于 6 月中旬抵达安庆。一路上，他到处张贴布告，阐明离京出走的原因，并表示要继续忠于太平天国的事业。石达开出走后，天王洪秀全曾派人将“义王”金牌一道及合朝文武要求他返回天京的表章送达安庆，争取他回朝辅政。这时，石达开理应从太平天国的全局利益出发，立即返回天京，与洪秀全同心协力，共挽危局；即使暂不回朝，亦应协同在江北的陈玉成部对清军进行反击，或进军江南，打击围困九江等地之敌，以解天京上游之危。但石达开不顾全局利益，竟南进江西，

招集旧部，独立进行新的远征。一、进军江西 1857 年 10 月初，石达开率部离开安庆，由安徽建德（今东至东北）进入江西，在景德镇会集各部，分路南进，经乐平、万年（今万年西），于 10 月 21 日占领安仁（今余江东北）。11 月 10 日，石部与由闽入赣的杨辅清等部（约四五万人）会师于贵溪，联合攻城未下，遂西走东乡，于 11 月底到达抚州，与原驻该处的余子安部会合。12 月初，派兵一部经进贤、丰城，西援临江（今清江西南）和吉安。吉安位于赣江西岸，1856 年冬即遭湘军围困。石部到达之前半月，东岸的吉水已落入湘军手中，故要解吉安之围，须先攻下吉水。石部对吉水先后发起三次进攻，均为湘军所败。这时，石达开听取元宰张遂谋的意见，决定放弃西援临江和吉安的计划，准备东进浙、闽。1858 年（咸丰八年）1 月初，石部经永丰、峡江、新淦（今新干）退回抚州。原驻江西各地的太平军，也陆续前来会合。2 月 26 日，石部由抚州东进，3 月 19 日败清军于上饶，进围广丰。因久攻不下，于 4 月 15 日撤围，经玉山入浙江，占领江山。杨辅清部则仍入福建，与石部分道而进。

石达开部南进之初，太平军在江西的兵力仍占很大优势（约十余万人），如坚持西援吉安、临江，给湘军以沉重打击，即可在江西开创新的局面。无如石达开轻率地放弃西援计划，东进浙江，结果继 1858 年 1 月 22 日临江失陷之后，九江、抚州、吉安等地也于同年夏秋先后失守，以致江西局势急转直下，使天京上游太平军的作战增加了困难。二、转战闽浙石达开率军占领浙江江山后，从 4 月 20 日开始，自统大军围攻衢州（今衢县），另由国宗石镇吉率兵一部连占常山、开化、遂昌、松阳

（遂昌东南）、处州（今丽水）、缙云、永康、武义、云和、宣平（遂昌东）等州县，控制了浙西南大片地区，牵制了相当数量的清军。

石达开部由江西东入浙江时，江南大营清军正在围困天京，清廷判断石部入浙的主要意图是抄袭苏常，回救金陵，于是命在湘守制的曾国藩（曾于1857年春由江西返湘奔父丧）统率在赣湘军，东援浙江。其实，石达开并无回救金陵之意，在衢州久攻不克的情况下，于7月14日撤围南行，越仙霞岭南趋福建。石镇吉部也奉命由浙入闽。8月中旬，石达开与石镇吉、杨辅清、杨义清等部会师于福建浦城。但杨辅清、杨义清随即率部返回江西，脱离石达开，后取道皖南回援天京。

8月底，石部继续南进，于30日攻占建阳，不久又西占邵武。石达开的战略目标是经赣南、湘南西入四川，因此，9月22日又撤离邵武，分军两路前进：石达开自统大军于10月中旬抵达福建汀州（今长汀），18日占领江西瑞金；石镇吉等率部直趋赣南，于江西新城（今黎川）为湘军刘长佑部所阻，不得已退回福建，经建宁、宁化到达汀州。此后，石镇吉等也率部脱离石达开单独行动（后经广东、湖南进入广西，1860年4月在广西百色被清军消灭）。

曾国藩自受命统兵援浙之后，7月中旬离湖南湘乡，8月底到达江西南昌，9月中旬抵赣东河口镇（今铅山）大营。随着石达开部向南推进，曾国藩又于10月中旬移驻江西建昌府（今南城）。

12月2日，石达开部由瑞金南进会昌，后经安远、信丰，于1859年（咸丰九年）1月3日攻克江西南安府（今大余），11日又克崇义。

当时，陈玉成、李秀成两支太平军主力，先后取得了二破江北大营和三河镇歼灭战的胜利，杨辅清部已攻克江西景德镇，长江南北又出现了太平军较为有利的形势。但石达开部却孤军南趋，“势乱而无纪，气散而不整”，战斗力已大不如昔。曾国藩命道员张运兰部由赣东之建昌驰援景德镇，命道员萧启江部四千余人继续尾追石部。萧部于2月18日进至南康，随即向南安府逼进。月底，石部弃南安、崇义，进入湖南境内。三、围攻宝庆石达开部由江西进入湖南后，于1859年3月2日占桂阳（今汝城），中旬连下兴宁（今资兴）、宜章、郴州（今郴县）、桂阳州（今桂阳）、嘉禾，准备取道湘西进入四川。

湖南是湘军的后方老巢。石达开率领号称二十万人（实约十余万人）的大军由江西大举入湘，不仅震动了湖南当局，也影响了各地湘军的军心。湖南巡抚骆秉章等急忙从本省各地征调兵勇赶赴湘南防堵，湖北巡抚胡林翼还从湖北派兵往援。

石部攻占郴州、桂阳州后，本欲北攻衡州（今衡阳市），由于清军在常宁、耒阳一带防堵，乃转兵西向，由嘉禾经宁远北上，从4月6日开始围攻永州府（今零陵），因连连受挫，只得撤围，分兵两路北趋宝庆府（今邵阳市），于5月10日和24日先后到达宝庆城外。

宝庆是湘南重镇。太平军抵达时，清军已作了布防：城东由总兵周宽世部和道员赵焕联部防守，城南由副将田兴恕部驻守；城西的资江则由水师巡防。

石达开到达宝庆后，设大营于城南十里之澄水桥，傅忠信部配置于城东十二里之泥湾，赖裕新部配置于资江西岸之神滩渡，从东、南、西三面构成对宝庆城的包

围。直至6月中旬，才切断北面通道，完成合围。

从6月下旬开始，清军各路援军陆续抵达宝庆外围。25日，知府刘岳昭率部抵达城东四十里的洪桥。7月4日，道员刘长佑亦率江忠义、刘坤一所部到达宝庆城北三十里的严塘。两路援军自东北方向节节推进。不久，胡林翼从湖北派来的道员李续宜所率湘军五千余人（共十一营）也经益阳、兰田（今涟源）、新化进抵宝庆，使宝庆地区的清军总数达到近四万人。7月24日，奉命总统宝庆东路军务的李续宜与刘长佑等于高家冲（距城九里）商讨解围之策。刘长佑认为“东路势厚，且岩壑幽邃，不可用武”，李“乃定计由北路进攻”。

石达开得知清军援兵大至，于7月25日督率各部包抄清军高家冲大营，与敌大战于蓝江铺、清水塘等处。27日，李续宜趁东路鏖战之际，率所部自高家冲西渡资江，在水师配合下，攻陷了太平军在田家渡至清水塘一带的营垒和哨卡。28日，西路的赖裕新所部太平军向北路湘军发起反击，又被李续宜等部击败，伤亡数千人，遂纷纷撤至资江东岸。西线既破，宝庆城内外的清军得以联成一气。此后十余日内，双方休战对峙。

8月10日，清军再次发起进攻，前锋推进到贺家坳、龙王桥一线。石达开鉴于清军兵力已厚，宝庆难以攻克，决定改变进军路线，南下广西，乃于13日一面派兵进攻贺家坳的湘军营垒，以掩护退却，一面命宰制陈亨容等率部南趋新宁，准备退路。8月14日晚，石部全线撤离宝庆外围，经白仓（今邵阳县南）南趋东安（今东安西南）。8月22日，各部由东安、新宁分别退入广西境内。

宝庆之战是石达开自天京出走以来所进行的规模最大历时最久（三个月）的一次作战。结果劳师费时，撤

围而去。究其原因，一是敌已有备，而且援军大至，兵力相当雄厚；二是长途转战，部队攻击能力减弱；三是没有及早合围，尽快发起攻击；四是没有在城北部署打援兵力，阻止敌人增援。

石达开部从江西进入湖南，既属过境入川性质（这里姑且不论其入川是否可取），就应师行间道，不攻坚，不恋战，力求行动迅速，争取早日入川。可是，由于贪攻永州、宝庆，结果迁延时日，使清军得以在湖南集结兵力，实行围堵，从而丧失了进军四川的时机。四、回师广西石达开率军退入广西后，经兴安、义宁（今灵川西）、永福等地，于10月15日轻取庆远府（今宜山）。由于清军兵力不足，没有立即进逼，石部得以在此安然度岁，进行休整补充。但庆远一带是人口稀少的贫瘠山区，大军（由于沿途扩充，此时约有二十余万人）久驻于此，军需给养发生严重困难，因而士气低落，军心涣散，不断发生分化。1860年（咸丰十年）1月，先有傅忠信、谭体元等率部出走，继有郑乔等所率“花旗”部（即1855年底于江西参加太平军的原广东天地会部分起义武装）离桂返粤。不久，又有余忠扶部杀余入黔。由于敌军逼近，石达开于5月底弃庆远，率部南下，后进驻宾州（今宾阳东北）、武缘（今武鸣）一带。同年秋，彭大顺、童容海、朱衣点等又率部东走（后在江西会合复由广东北上的郑乔等部，众达二十万，1861年9月在江西河口镇并入李秀成部，重归天朝）。

鉴于众叛亲离，良将精兵尽去（当时仅剩万余人），石达开一度产生隐退的念头，但无安身之处。在无可奈何之中，他只得勉力支撑。幸好当时新任广西巡抚刘长佑等部清军正集中兵力进攻陈开领导的大成国起义军，

为石达开继续在广西活动和重整旗鼓提供了机会。1861年（咸丰十一年）8月下旬，大成国的京城秀京（即桂平）失陷，不久陈开被俘遇害，其余部约三万人即投奔石达开麾下。于是，石达开的队伍得以扩大，号称十万，但战斗素质已远不如前。为开创新的局面，石达开决定重新打起远征四川的旗号。不久即率全军离开广西，北进湖南，伺机西入四川。五、辗转入川 1861年10月下旬，石部自桂北进入湖南，进攻绥宁（今绥宁西南），后沿湘黔边境北进，经靖州（今靖县）、会同、沅州（今芷江）、泸溪、永绥（今花垣）、于1862年（同治元年）1月底经龙山进入湖北来凤，2月中旬又经湖北利川进入四川境。

在石部入川以前，清廷除责令新任四川总督骆秉章饬令川东镇道督率兵勇严密堵剿外，又责令湖广总督官文、新任湖北巡抚严树森督饬在防将弁，会同新任湖南巡抚毛鸿宾等所派各部，实行“三面兜剿”，企图将石部一举歼灭于湘鄂川黔边界。由于四川清军主力未能及时赶到川东前线，清廷的上述计划未能实现。

石达开率军入川后，于1862年2月20日占领川东石碛厅（今石柱）。因北有大江阻隔，只好沿长江南岸向西推进。4月上旬攻涪州（今涪陵）不下，5月上旬攻綦江又不下，乃西走合江，入贵州仁怀厅（今赤水），复折入四川，于5月26日占叙永，6月16日克长宁（今珙县东）。由于沿途扩军，石部总数又达十余万。不久，各地清军赶到，北进之路受阻，不得不折而东走，于8月中旬再经贵州仁怀厅境趋建义、黔西，10月20日进围贵州大定府（今大方）。这时，一度曾随石镇吉行动的宰制曾广依部也来会攻，但终未攻克大定。于是，石达开

率部西走毕节，入云南境；为了牵制清军，派宰制李福猷会同曾广依率部南走水城、郎岱（今贵州六枝西南），然后西入云南。

石部进入云南后，又分兵三路入川：宰辅方元祥等率数万人从川边屏山县进入，东趋叙州府（今宜宾市）；宰辅赖裕新率二三万人经昭通、东川（今会泽），西渡金沙江，北攻四川宁远府（今西昌），“使官兵不能兼顾”；石达开自率本部大军由镇雄北进四川，于11月18日占领筠连，22日进占高县，并前出到横江镇、双龙场、玉黄楼一带，与方元祥部夹横江为营，伺机由横江顺流而下，抢渡金沙江，进图叙州府。不久，李福猷、曾广依部也前来会合。四川总督骆秉章为阻止石部入川，急调各路清军密集横江两岸：先调云南提督胡中和及总兵何胜必、萧庆高督军由犍为驰赴叙州以南，“相机截剿”；继调总兵唐友耕部由江安疾趋庆符，按察使刘岳昭部由綦江驰赴长宁、珙县。云南巡抚张亮基在叙州闻警，也派参将杨发贵率部赴安边铺（叙州西南）协防。12月下旬，清军连续向石部发起进攻，双方互有伤亡。1863年（同治二年）1月1日，清军进逼横江镇，同时大败横江西岸的方元祥部。1月8日，清军又大举进攻双龙场。石达开挥军迎敌，将清军击退。此后，战事呈胶着状态。1月30日，刘岳昭、胡中和等再次率部猛攻双龙场。由于石达开的部将郭集益等暗中通敌，石部大败，伤亡惨重，不得不于次日全部撤离四川，复入云南，驻扎于昭通一带。六、石达开部的覆灭及其教训 1863年3月，石达开决定兵分两路，再次进军四川。自统西路，沿金沙江西行，伺机渡江北进；李福猷统率东路，绕道贵州北上入川。

3月24日，李福猷率队分路入黔，一由镇雄趋毕节，一由昭通趋威宁、水城。5月初，全部由仁怀东趋遵义。5月底，又自遵义、桐梓一带东进，经绥阳抵婺川（今务川）。7月，自婺川西攻正安不下，乃入四川境。8月下旬，经酉阳、彭水，进至黔江。

石达开于5月12日率三四万人自云南昭通进入四川宁远府境。四川总督骆秉章与布政使刘蓉早已沿大渡河严密布防：署雅州府（治今雅安）知府蔡步钟就近募勇，配合总兵唐友耕等部扼守北岸安庆坝至万工汛大小渡口；松林地（今石棉西北）土司千户王应元率“土兵”扼守松林河，并调胡中和部驻扎于化林坪（今泸定南）一带，以为声援；都司谢国泰部守猛虎冈，控制通打箭炉（今康定）之路；邛部（今越西东北）土司岭承恩率兵控制越嶲大路各隘，以逼迫石部“入夷地小径”，然后“从后路包抄”。清军如此层层设防，对不熟悉当地地形而又孤军深入的石达开部来说，几如陷阱。

石部由宁远北进时，侦知越嶲大路有敌军扼守，便以“土人”为向导，绕经冕宁，抄小路北上，直抵大渡河边的紫打地（今安顺场）。紫打地在崇山峻岭之中，大渡河横亘于前，松林河及察罗河分隔左右，又逢大雨，河水骤涨，敌军严守对岸渡口，石部实难飞渡。石达开只得命令部队搭棚驻扎，赶造船筏，准备强渡。5月21日，以四五千入强渡大渡河未成，船筏全毁，伤亡甚众。后决定西渡松林河，冀由泸定桥直趋天全，因遭土司王应元等部的阻击，西进计划又告落空。嗣后，清军四面逼攻，石部弹尽粮竭，陷入绝境。石达开曾致书王应元等，许以重金“买路”，但遭拒绝，乃于6月3日令所部分两队突围。一队抢渡大渡河，一队抢渡松林河，均

未成功。他见大势已去，令妻妾五人、幼子二人投河自尽，自带五岁幼子石定忠及宰辅曾仕和等四人于6月13日前往清军营垒，幻想牺牲自己，保全部众。岂知反动派决不刀下留情，他们将石部所剩七千余人全部处死，并将石解往成都。8月6日，石达开于成都从容就义，时年三十三岁。

进至黔江的李福猷部得悉石达开在大渡河全军覆没的消息，乃放弃入川会师的计划，东入湖南永绥，然后沿湘黔边境南下，经会同、绥宁重入广西，于10月9日攻占龙胜。10月17日，又经兴安东趋灌阳。此时，李福猷与其弟李福忠发生分裂。李福猷自率一部由灌阳东入湖南道州、江华，活动于粤桂边境，年底被清军消灭。李福忠则率部经湖南城步、通道入贵州，后在湘桂黔边区坚持斗争，直至1871年8月失败。

石达开于1857年率部出走后，行程数万里，进行了历时六年的远征，最后终于在四川大渡河畔全军覆没，这个历史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石达开率军他走，不符军心民意。随着其错误行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加上孤军远征，困难越来越大，广大将士感到前途渺茫，以致分化和投敌事件层出不穷，直至在广西境内发展到众叛亲离的地步。

石达开率军远征的目标是进入四川，这是他在起义初期就提出过的进军方向。四川是清王朝的战略要地之一，又利于割据，倘能入据该省，实行正确的方针政策，反抗清王朝的统治，对全国革命自然是有利的。但石达开在当时形势下，以其所处的战略位置（远离四川），不依靠革命势力强盛的江、浙、皖、赣，而孤军远征四川，胜利的把握是不大的。在进军过程中，石达开在作战指

导上又缺乏一个正确的方针，东奔西走，强攻坚城，以致劳师费时，给了敌人以部署防御的时机。经过广西大分化之后，老部队所剩无几，而清廷已调骆秉章及万余湘军加强了四川的防御，石达开不能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放弃进军四川的计划，改取联合西南各族人民起义军共同反清的方针，以积聚力量，等待时机，再图大举，而是不顾主客观情况，执意进川，结果一败再败，造成全军覆没的可悲结局。

石达开在太平天国前期战争中不愧为著名的战将，但自率部脱离天京之后，孤军冒进，没有后方的支持，没有友军的配合，成了流寇式的草莽英雄。尽管一度拥有号称数十万之众，却没有打过多少象样的胜仗，一直摆脱不了被动的处境，最后终于陷入绝地，被数量有限的清军和土司部队所歼灭。石达开这位“绝世英物”，竟成了清军的俘虏，这决不是什么“恶运使然”，也不是偶然发生的不幸，而是他政治上不顾大局，军事上实行流寇主义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二破江北大营与三河镇大捷

石达开出走后，安王洪仁发、福王洪仁达掌握了太平天国的军政大权。由于他们毫无军政才能，朝中文武大臣不服。1857年10月，洪秀全改以蒙得恩为正掌率，陈玉成为又正掌率，李秀成为副掌率，代替安、福二王执政。次年，洪秀全又提拔了一些年青将领，恢复了早期的五军主将制，封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李世贤为左军主将，韦志俊为右军主将，蒙得恩为中军主将兼正掌率，掌理朝政。这些措施，对稳定政

局起了一定作用。然而，在军事上，太平天国当时面临的形势仍然是十分严酷的。继 1857 年底镇江、瓜洲失守之后，1858 年 1 月，江南大营的清军进扎天京高桥门、龙脖子，进逼秣陵关；江北大营则于 1858 年春移驻天京对岸之江浦、浦口，会同江南大营，缩小对天京的包围圈。同年 5 月，九江失守，天京的西面屏障安庆也受到湘军的直接威胁。直至同年 9 月和 11 月太平军取得二破江北大营与三河镇大捷之后，形势才为之一变，基本上扭转了天京内讧以来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萎靡不振的局面。一、枞阳会议为解天京之围，李秀成于 1858 年 3 月底请命出京，途经芜湖，与其弟李世贤商定，“一人敌南岸，一人敌北岸”。不久，李秀成自率部将陈坤书等五千余人，分别由芜湖和东梁山渡过长江，齐集含山，于 5 月 8 日再克安徽和州（今和县），接着又连占全椒、滁州（今滁县）、来安。

由于天京被围日紧，南郊板桥、大胜关已被敌攻陷，七桥瓮、印子山、雨花台也处于敌军的直接威胁之下。李秀成日夜焦虑，在全椒加紧操练部队，准备先扫清江浦、浦口之敌，以安定天京人心。6 月 5 日，他率兵五千余人自全椒进扎江浦大刘村，拟取道桥林进攻江浦、浦口。次日，江北大营统帅德兴阿督军万余进攻大刘村。时适大雨滂沱，太平军疏于戒备，以致寡不敌众，初战失利，损失千余人，新旧营垒十三座尽失。这使李秀成意识到，单凭一军之力，难解天京之围，于是行文各路将领，约定在安徽枞阳举行会议，共商救京办法。

8 月上旬，李秀成与陈玉成、李世贤等将领于枞阳商定：先由陈玉成、李世贤等率部攻克安徽庐州（今合肥市），然后由吴如孝率部在庐州东北一带活动，牵制胜